

郑 州 大 学 文 博 学 院 编
开 封 市 文 物 工 作 队

豫东杞县 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豫东杞县发掘报告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 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0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报道了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博物馆于1989~1990年在豫东杞县境内的段岗、鹿台岗二遗址发掘所获资料,时代从仰韶、龙山至夏、商、东周时期,尤以龙山与夏代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其重要意义是在杞县发现了夏代的夏族、商族、东夷族三种考古学文化,这对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本书还发表了有关的环境信息。

读者对象为考古、历史以及全新世环境专业的工作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豫东杞县发掘报告/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ISBN 7-03-008234-6

I. 豫… II. ①郑…②开… III. 夏文化(考古)-发掘报告-河南-杞县 IV. 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950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西源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0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0年7月第 一 次印刷 印张: 16 3/4 插页: 12
印数: 1—1 800 字数: 385 000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11-17-11

目 录

壹 概述	1
1.1 地理位置	1
1.2 历史沿革	2
1.3 区域景观组分及其变迁概述	2
1.3.1 地貌	2
1.3.2 水系	3
1.3.3 气候	4
1.3.4 生物群落	4
1.3.5 土壤	5
1.4 聚落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环境信息	5
1.5 景观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6
1.6 区域考古学文化概述	7
1.7 工作背景	8
1.8 工作目的	9
1.9 工作过程	9
贰 鹿台岗遗址	12
2.1 遗址概况	12
2.2 探方分布	12
2.3 地层堆积	13
2.3.1 T27 北壁	14
2.3.2 T24 南壁	16
2.3.3 T2 北扩北壁	16
2.3.4 T1 南壁地层剖面简况	17
2.4 仰韶文化	17
2.4.1 遗物	18
2.4.2 环境信息	19
2.4.3 小结	22
2.5 河南龙山文化	22
2.5.1 遗迹	22
2.5.2 遗物	39
2.5.3 小结	79

2.6	先商文化	88
2.6.1	遗迹	88
2.6.2	遗物	89
2.6.3	环境信息	113
2.6.4	小结	114
2.7	岳石文化	116
2.7.1	遗迹	116
2.7.2	遗物	118
2.7.3	环境信息	139
2.7.4	小结	139
2.8	早商文化	141
2.8.1	遗迹	141
2.8.2	遗物	143
2.8.3	环境信息	154
2.8.4	小结	156
2.9	春秋时期文化	156
2.9.1	遗迹	156
2.9.2	遗物	158
2.9.3	小结	160
叁	段岗遗址	161
3.1	遗址概况	161
3.2	探方分布	161
3.3	层位关系	161
3.3.1	89 I T12 北壁	164
3.3.2	89 II T13 西壁	164
3.4	河南龙山文化	165
3.4.1	遗迹	165
3.4.2	遗物	171
3.4.3	环境信息	185
3.4.4	小结	186
3.5	二里头文化	191
3.5.1	遗迹	191
3.5.2	遗物	202
3.5.3	环境信息	230
3.5.4	小结	230
3.6	晚商文化	238
3.6.1	遗迹	238
3.6.2	遗物	239
3.6.3	环境信息	240
3.6.4	小结	242

3.7 春秋时期文化	242
3.7.1 遗迹	242
3.7.2 遗物	249
3.7.3 环境信息	252
3.7.4 小结	252
肆 结语	253
4.1 关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若干问题	253
4.2 “先商文化”确立之新证	254
4.3 关于杞县先商文化的来源	255
4.4 杞县境内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256
4.5 关于夷夏商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域	257
后记	260

图版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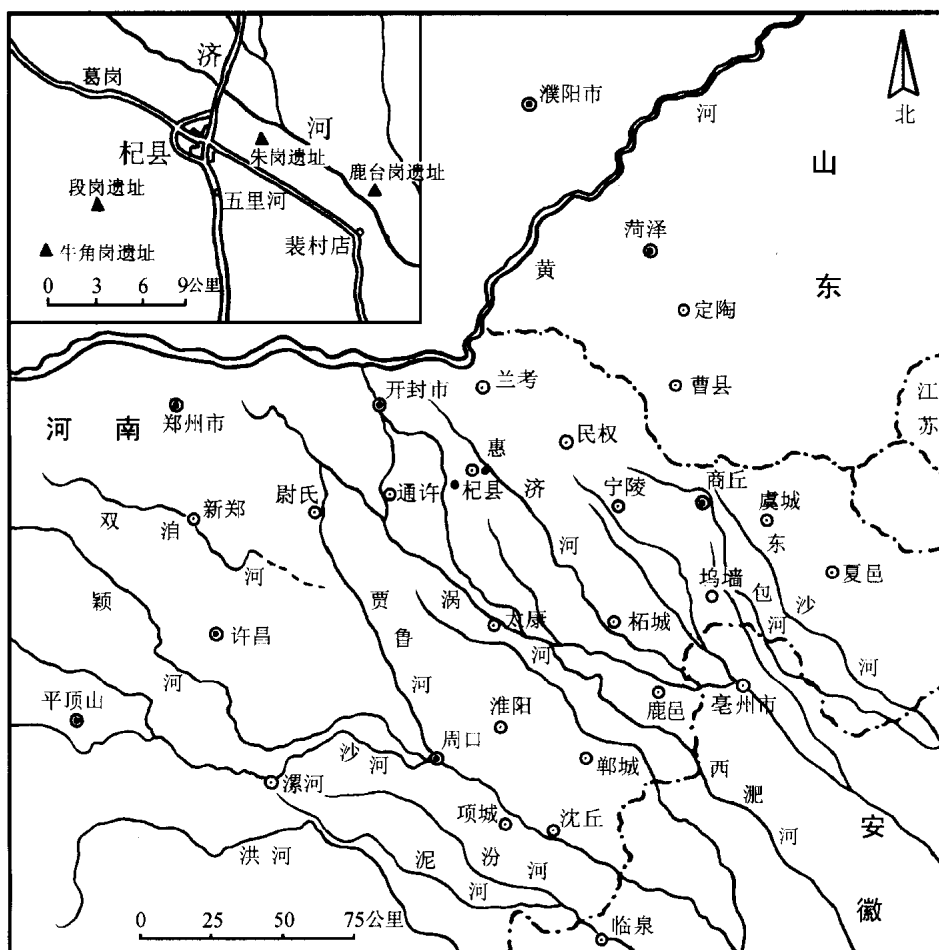
- 彩版一 鹿台岗遗址龙山时代文化遗迹
- 彩版二 鹿台岗遗址龙山时代文化遗迹
- 图版一 鹿台岗遗址龙山时代文化器物
- 图版二 鹿台岗遗址龙山时代文化陶器
- 图版三 鹿台岗遗址龙山时代文化陶器
- 图版四 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器物
- 图版五 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陶器
- 图版六 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陶橄榄形罐
- 图版七 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陶鬲
- 图版八 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器物
- 图版九 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陶器
- 图版一〇 鹿台岗遗址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器物
- 图版一一 段岗遗址龙山时代文化陶器
- 图版一二 段岗遗址龙山时代文化陶器
- 图版一三 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陶中口深腹罐
- 图版一四 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陶中口深腹罐
- 图版一五 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
- 图版一六 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
- 图版一七 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
- 图版一八 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
- 图版一九 鹿台岗遗址和段岗遗址陶器

壹 概 述

1.1 地理位置

豫东平原地处黄河大冲积扇的东南翼，与鲁、苏、皖三省接壤，跨黄河、淮河两大水系。杞县属于淮河流域，境跨北纬 $34^{\circ}13' \sim 34^{\circ}44'$ ，东经 $114^{\circ}36' \sim 114^{\circ}54'$ ，东距商丘约 90 公里，西距郑州约 120 公里，周邻睢县、民权、太康、通许、兰考、开封诸县。

本报告的鹿台岗遗址位于杞县县城东约 12 公里的裴村店乡鹿台岗村，段岗遗址位于杞县县城西南约 7 公里的段岗村和曹岗村之间（图一）。



图一 杞县鹿台岗遗址与段岗遗址地理位置图

1.2 历史沿革

豫东属远古时代的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交汇地,其东有高辛氏,南为淮夷,西乃夏后氏,北邻高阳氏^[1]。龙山时代,豫东及鲁西南和皖北一带属有虞氏居地^[2]。

据历史文献记载,夏时期,豫东曾为夏、商、有虞氏、有莘氏等部族的活动范围;商时期,该区有杞、姚等方国;西周、春秋时期,此地乃宋、杞、戴、戎、郕、陈、曹、鄆诸方国之封疆;战国时期,这里又分别为郑、韩、宋、魏诸国所统辖^[3]。

杞县为《禹贡》豫州之域,夏代杞氏之居^[4]。商初,汤又封夏王室之后于此。《大戴礼记·少间》:“成汤卒受天命……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路史》:“汤封少康之后于杞,以郊禹。”《史记·留侯世家》:“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陈杞世家》:“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汉书·梅福传》:“故武王克殷,……封殷于宋,绍夏于杞。”《世本》:“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

“杞”于殷墟卜辞和晚商铜器铭文中屡见,如“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后上一三·一)。《杞妇卣》铭文:“亚丑,杞妇。”据《路史·国名记丁》和王国维等考证^[5],商代杞国即今杞县之所在。

杞国于春秋初年迁至山东安丘、诸城一带,《春秋·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隐公四年曰:“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

杞县始名于唐初,后又称雍丘,金复改杞县。元、明、清属开封府。民国初属豫东道,1927年废道后直隶河南省政府。1949年属陈留专区,后又划归郑州专区、开封专区,1983年后属开封市辖区。

1.3 区域景观组分及其变迁概述^[6]

1.3.1 地貌

豫东位于华北地台区的南缘,在距今约300万年的第四纪初,其地貌轮廓已基本构成。上更新世以来地壳的三次剧烈沉降与相对稳定,形成上更新世、早全新世和晚全新世三期大规模的掩覆沉积。下伏地层为覆盖在太康隆起和开封拗陷等拗隆重构造基底上的第三纪胶结和半胶结的黏土岩、砂岩等,其与上覆第四纪的黏土、亚黏土、粉质亚黏土、粉砂、中细砂和粗砂等地层共厚逾千米。

豫东地处黄河大冲积扇之东南翼。现今地貌以黄河、淮河干支流冲积的平原为主,地表广阔平坦,松散堆积深厚。由于黄河先期决口、改道后留下的自然堤被以后改道的主流截断,因此形成很多碟形和槽形洼地,如开封、杞县间的蒋洼、鹅洼,以及决口后形成的坑潭洼地。这些洼地与河流沟通者多成湖沼。

淮河以北、颍河以南为淮北平原,黄河以南,颍河以北为豫东平原。以淮北平原为轴线(北西南东向),海拔高度由西部山麓的200米左右向东南逐渐降至30米左右,平均坡

降 0.6‰；轴线以北，自黄河岸边向南缓缓倾斜，海拔高度由 80 米左右降至 40 米左右，平均坡降 0.2‰；轴线以南，自大别山麓向北倾斜，海拔高度由 120 米降至 40 米，平均坡降 0.55‰。大致以郑州到兰考间的黄河河床为脊轴，地势又分别向东北和东南倾斜，海拔高度多在 100~50 米之间，地表坡降在 1/5000~1/8000 之间。

扶沟、陈留、睢县一线西北，为沙丘、沙地大面积集中分布区。这一带为黄河冲积扇南翼之上部，黄河泛滥时首当其冲，粉细沙、细沙以及中沙等粗粒物质大量沉积。这些沙质沉积物在长期的风蚀作用下形成沙丘、沙链、碟形洼地等绵延起伏的沙地景观。

杞县地貌主要为黄河与淮河水系的冲击、泛滥所营造，地势较为平坦，由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海拔 58 米。境内多为平原，仅有高于地面 10 米左右的土岗、沙丘 10 余处，如县东的东铁岗等。

1.3.2 水 系

黄河、淮河为流经豫东的两大河流。自早全新世以来，黄河下游一直处于强烈的沉积环境中。战国时期黄河即有“浊河”之称，西汉时人称“河水一担，其泥六斗”。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而东出邙山后，在人工大堤的约束下形成著名的“悬河”，成为奇特的河道式分水岭，因之也以现今郑州至兰考间的黄河河道为脊轴，将豫东平原分为两个不同的流域：黄河以北属海河流域，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河流也由西南向东北流入海河；黄河以南属淮河流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河流自西北而东南流入淮河。

《汉书·沟洫志》引《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河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周定王五年为公元前 602 年，自此次大的河徙至今，黄河决口达 1500 多次，重大改道 7 次，洪水北抵海河，南越淮河^[7]。谭其骧曾云：“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流入渤海的。”“黄河下游在战国筑堤以前，决溢改道是屡见不鲜的事。其时河北平原中部是一大片人烟稀少荒芜寥落的地图上的空白地区，黄河在这里决溢改道，对人民生活的影晌很小，因而也就为一般古代文献记载所不及。”^[8]又云：“其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也确乎不会轻易决口改道”。黄河在豫东的泛滥，应主要发生在汉代尤其是唐代之后^[9]。

豫东大部属淮河水系。淮河水系的特点是以淮河干流为轴线，北岸支流众多，流程长，纵比降小，汇水面积大；南岸支流少，流程短，河道纵比降大，汇水面积小。杞县境内较大的河流有惠济河、淤泥河、杜庄河、茅草河、铁底河等，全长 213.9 公里，为雨源型河流。

豫东地表水主要来自大气降水，由于夏季降水占年总量的 70% 左右，冬季不到 10%，秋雨一般多于春雨，所以径流量年内分配极不平衡。淮河以北，汛期径流量约占 60%~70%。径流集中在 6~8 月份，以 8 月份最大，秋水大于春水。年最小径流出现在 4~5 月份，最枯流量接近零。年径流深绝大部分在 25~30 毫米之间，离差系数高达 0.8 左右。本区蒸发力强，年均水面蒸发量达 1300~1700 毫米，年均干燥度在 1.2~1.5 以上，春季和秋季的干燥度可达 3~3.5 以上。

豫东及其周邻地区古代湖泊、沼泽众多，见于《左传》、《禹贡》等记载的就有圃田泽（今郑州、中牟间）、孟诸泽（今商丘东北）、大野泽（今虞城北）、蒙泽（今商丘东北）、

逢泽（今开封南）、中牟泽（今中牟东）、牧泽（今开封东南）、雷泽（今山东菏泽、鄄城间）、菏泽（今山东定陶）等。杞县西北有奸梁陂，县东有白洋陂。当时这些湖泊的面积都很大，《水经注》载，圃田泽东西 40 余里，南北 20 余里，《元和志》载大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春秋时代或以前这些湖泊的面积可能更大。

1.3.3 气候

豫东属暖温带大陆型气候，春季干旱，夏、秋旱涝交替。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在 -10°C 左右。春季（4 月）气温上升较快，风沙频率较大。夏季炎热，多偏南风，最热月（7 月）平均气温在 $27\sim 28^{\circ}\text{C}$ 之间。年均气温 $14\sim 15^{\circ}\text{C}$ ，年均日照时数为 2000~2500 小时左右。日平均气温稳定， $\geq 10^{\circ}\text{C}$ 的作物旺盛生长期 210~220 天。年湿润系数为 0.7~1.0，但春（4 月）、秋（10 月）皆小于 0.6，处于半干旱状态。年平均降水量 600~800 毫米，年内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夏季水汽充足，降水量可达 400 毫米，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50%。但降水强度和变率较大，易形成水灾和旱灾。冬、春时节受干冷的大陆气候团控制，雨水稀少，气候干燥，加之地面增温快，蒸发旺盛，水分的支出远大于收入，因而旱象频生。一般情况是旱波及面广、涝危害较重，二者相比，涝重于旱。

杞县年均无霜期 210 天，年均降水量 722.9 毫米，年均气温 14.1°C 。农作物可一年两熟。

豫东在仰韶文化时期属温暖期，比现代温暖湿润，湖泊面积扩大，生活在浅水环境中的水蕨等水生生物的生态位可达平原北部。夏商时期，这一地区仍较温暖。自西周至两汉，有两次显著的冷暖交替：西周气温寒冷，标志着本区全新世中期温暖气候的终结；春秋时期比现代温暖；战国至西汉初气候复变冷；自西汉中叶至东汉末，气候再度回暖。

1.3.4 生物群落

豫东的当代植被全为栽培作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红薯、棉花、芝麻、大豆等一年两作群落。自然植物 100 多种，以禾本科、莎草科、菊科、藜科为多，常见的有狗尾草、马唐、莎草、马齿菜、罗布麻等。平原地区的沙丘、沙地及西部岗地上，主要是刺槐、旱柳、杨和沙蓬等组成的群落，盐碱土上生长着碱蓬、隐花草、灰藜等盐生植被。

本区目前的动物区系为干旱平原型，兽类贫乏，黄鼬、草兔是本区的优势种，其次是仓鼠、田鼠，还有稀少的刺猬、狐、猪獾等。鸟类以华北区系种类占优势，灰喜鹊为突出优势种，秃鼻乌鸦和喜鹊常见，还有雁、鸭、白骨顶、黑水鸡、楼燕、云雀、山麻雀等。爬行类以丽斑麻蜥、山地麻蜥为优势种。蛇类有黄脊游蛇、赤链蛇、白条锦蛇。两栖类的中华大蟾蜍、花背蟾蜍、泽蛙等数量众多。已发现的鱼类近百种。

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中全新世以前，本区森林广布，植被良好。《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禹贡》描述豫东之北的兖州的植被为“厥草惟繇，厥木为条”，豫东东部的徐州为“草木渐包”。直到西周和春秋前期，豫东的人口密度仍较小，人类对生态的破坏程度尚不严重，一些地方的植被状态可能还接近原始状态。如郑国迁都新郑时，“斩之蓬蒿藜霍而共之”（《左传》昭公十六年），当时的宋、郑两国之间尚有

“隙地”，见诸记载的森林就有北林（今新郑）、株林（今柘城）等。

野生动物的种属、数量等也可反映植被状态。豫东所有早期古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鹿角。《左传》记载，原圃有麋鹿，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有麋（即獐）。鸣鹿（今河南鹿邑西）、鹿上（今安徽阜南南）等地名，也表明当时本地区鹿的众多。

春秋战国之际，豫东天然植被开始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春秋后期，这一带先后建立了六个邑，“隙地”遂大大减少。战国时期，本区成为生产发达、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农区。以今商丘为中心的宋国，是“中国膏腴之地”，“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天然植被的毁坏，湖泊遂急剧萎缩，以致经济发达的宋国发生了“无雉兔鲋鱼”、“无长木”的生态危机。

西汉时期，本区的原始林木资源或已面临枯竭，《汉书·贡禹传》载：“攻山取铜铁……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不由此也”，表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过度樵采与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恶果。

1.3.5 土 壤

豫东的土壤属潮土和碱盐土区，以潮土为主，可粗分为潮砂土、两合土、潮淤土三个土属。

潮砂土主要分布在黄河故道和泛道的主流地带及河流两岸，主要包括开封、尉氏、兰考、民权、长葛、中牟、新郑、封丘、原阳、滑县、濮阳等地，多呈条带状分布。粗砂土多呈沙荒岗地，生长小灌木和茅草，地表有机质含量很低，且漏水漏肥，仅适合种植花生、红薯等。细砂土质地疏松易耕，因耕作年久而熟化程度较高，有机质含量较多，但保水保肥差，虽有团粒结构，但不稳定。

潮淤土主要分布在开封、周口等地区，耕性不良、黏粒含量丰富，非毛管孔隙少，通透性差，有效水含量低，潜在肥力高，发老苗不发小苗，淤土地的各项养分含量在潮土中最高。

两合土是沙、黏比例适中、经熟化耕作而形成的土壤，主要分布于沙土与淤土的过渡地带，质地适中，主要为沙壤土、壤土，疏松易耕，耐旱耐涝，通气透水，保水保肥能力强，有机质含量较高，民谣曰：“买牛要买抓地虎，种地要种两合土”。本区以两合土类所占面积较大。

本区盐碱土为潮盐土类型，主要分布在今黄河以南（包括明清故道）、通许、太康、鹿邑、永城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盐碱化程度最高。土壤一般呈碱性，pH值多介于7.5~8.0之间，有机质含量0.8%~1%，含氮量0.08%~0.1%，含钾丰富。但沙壤肥力较差。

杞县境内多为两合土类潮土。全县地质类型分为青沙土区、两合土区、淤土区，分别占总面积的31.2%、44.5%、24.3%。

1.4 聚落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环境信息

英国地理学家海格（Peter Haggett）认为：“聚落是人类占据地表的一种具体表现，

因此它们形成地形的重要组成部分^[12]。”在上古时期，由于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力强，因而早期人类总是趋利避害，以求与其所处生态系统相适应。所以从聚落的密度、大小、位置等，可窥见当时的环境状况。

本区虽自上古以来屡受河、济湮没，但并非无古可考，因为古文化遗址分布的密度，并不比中原其他地区稀疏。据调查，在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淮河以北的开封、兰考、民权、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尉氏、通许、杞县、太康、柘城、扶沟、西华、商水、淮阳、郸城、鹿邑、项城、沈丘等 22 个县中，共发现战国以前的古文化遗址 240 处^[13]。其特征是：

1. 古文化遗址多为突兀隆起的台地。这些台地有堦堆、山、岭、丘、台、岗、冢、埠、城、庙、阁、寺诸称。在上述 22 县的 240 处古遗址中，以岗、台诸称为名的古遗址有 98 处，约占全部遗址的 40% 以上。其中杞县、民权、睢县、宁陵、太康、淮阳、鹿邑等县高达 60%~70% 以上。另有不少非以岗、台等为名的平地遗址，过去也为台地。

2. 在上述 22 个县中，已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仅 3 处，仰韶文化遗址 5 处，大汶口文化遗址 12 处。而到了龙山时代，遗址数量猛增至 112 处。夏、商、西周和春秋各时代的遗址数也少于龙山时代。

鲁西南、苏北、皖北和豫东皆地势低洼，处于河流决溢、湖泊泛滥的威胁中，故上古居民皆“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齐俗训》）。这是豫、鲁、苏、皖邻境地区普遍流行堦堆遗址的根本原因。

1.5 景观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根据以上背景，可以发现，豫东原始景观组分的异质性较强，其对早期人类的生存活动的影响，应具有正面与负面效应并重的特点。

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豫东皆为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四方文化的荟萃地。这种开放性的区位优势，不仅便于当时人类与周邻部（民）族的联系与交流，而且有利于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的循环与流通。

豫东平原面积广阔，松散堆积层深厚、疏松，易于耕种。每年春、夏，值作物的播种期和生长期，太阳辐射强，降水量大，雨热同季，足可满足多种作物的生长之需；继之秋高气爽，阳光充足，又有利于作物的成熟。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水资源也十分丰富。

豫东上古时期森林茂密，草原广阔，河流纵横，湖泊众多，物种多样，这便使早期人类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可进行采集、狩猎和捕捞等经济活动。

豫东原始景观对早期人类的负面效应主要在于：

水灾与旱灾是本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本区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不均，极易形成旱涝交错的复杂局面。本区虽属平原，但在降水分布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最多雨量带位于本区东部的低洼地区，易形成内涝。黄河沿岸为最少雨量带，加之系沙质土壤，保水能力差，易导致干旱^[15]。据河南省大水大旱表所载水灾统计资料，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 年）至 1985 年的 1387 年间，商丘地区共发生大水灾 220 次，平均每 6.3 年一次，而且周期有逐渐缩短的趋势。近代豫东易发生水灾的原因主要是，流经平原的河道，湾多

水浅,水流缓慢,每遇大水河道不敷宣泄,地面易积水。如永城、项城一带的低洼地,遇100毫米的暴雨就会积水成涝,200毫米以上的暴雨就会发生小河道决口^[16]。因此,上古时期豫东的水、旱灾害也应是相当严重的。《史记》载“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帝尧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用大禹治水,“抑洪水十三年”。夏末商初,中原地区出现严重干旱,有《吕氏春秋》“殷汤克夏,而大旱”为证。

制约本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盐碱与风沙。

黄河流经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重盐碱区后,河水含盐量骤增(黄河下游水质矿化度为0.20~0.36克/升),因此,它在豫东的每次泛滥、改道或渗流,都会造成大面积的盐碱地。《管子·轻重乙》“带河负济,直泽之萌也”,苴草属耐盐植物。这表明,在当时黄河与济水的连接地带,存在低湿的盐渍化土地。据80年代统计,豫东商丘地区的盐碱化土地面积高达140余万亩。

风沙是本区的自然灾害之一。豫东分布着广袤的沙质土地,每年冬春时节,植被枯落,撂荒轮作制下的裸露地表经霜冻、开化的轮回后会变得更为疏松,加之其时干旱少雨,因而每遇大风,便极易引起风蚀,造成土地大面积的沙质荒漠化(当地多为粒径甚小的粉沙,按风沙地貌学原理,在这种情况下,5米/秒以上的风速即为起沙风)。故当地流传有“风卷黄沙起,袭人刮地皮,庄稼无收成,人瘦地无力”的民谣。

蝗虫种群多聚集在平原下洼地。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曾说:“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如前所述,本区上古时期广布低洼的易积水地和沙荒地,这就为东亚飞蝗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鄆城、淮阳、项城等地,60年内蝗灾最大发生率为9次、10次和8次,其中淮阳在明崇祯六年至十三年8年内连年发生蝗灾^[17]。不难想象,类似的蝗灾上古时期也当存在,并对当地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危害。

1.6 区域考古学文化概述^[18]

本区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我们在调查中曾发现尉氏兴隆岗、马家庄、杞县孟岗、扶沟前闸、雁周、宋马岗等遗址包含裴李岗文化遗物。除孟岗外,位置多偏西^[19],其面貌尚不清晰。

仰韶文化时期,本区东部属大汶口文化系统,虞城营廓、夏邑三里堽堆遗址都含有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20]。本区西部的太康方城、扶沟支亭、睢县周龙岗等遗址的器物具有仰韶文化早期器物的特征,文化面貌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接近。尉氏大桥、程庄、冉家、断头岗、大辛庄、靳村、杞县竹林、睢县周龙岗等遗址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特征与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相仿^[21]。本区属于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错分布地带。

庙底沟二期阶段,中原文化东向发展,本区基本脱离了大汶口文化系统,这类遗存在郸城段寨^[22]、永城黑孤堆^[23]、鹿邑栾台^[24]、萧县花甲寺^[25]等遗址均有发现,有研究者将这类遗存称之为“段寨类型”^[26]。

龙山时代,本区偏东部属造律台类型^[27],遗址众多,如永城王油坊^[28]、商邱坞墙^[29]、睢县周龙岗^[30]、鹿邑栾台、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31]、萧县花甲寺、曹县莘冢集^[32]、菏泽安邱堽堆^[33]等。造律台类型虽与山东龙山文化有一定联系,但与豫中豫北地

区一样,应同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系统。本区偏西部的文化面貌与王湾三期近同。本期遗存中还包含较多的后冈二期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多种类型文化因素的融合与并存,是本区龙山时代文化的显著特点。

夏代,本区为夏、夷、商三大古族文化的交汇地。本区东部为岳石文化分布区,经发掘和初步调查发现的遗址有夏邑清凉山、鹿邑栾台、虞城杜集、柘城山台寺、亳县两河口、濉溪马古堆、宿县禅堂等^[34]。本区西部为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已发现的遗址有西华陆城、后于王庄、项城骆驼岭、商水王田寺、太康方城等^[35]。我们调查发现的遗址有杞县段岗、牛角岗、朱岗、西伯牛岗、尉氏要庄、西王村等。其与豫西二里头文化面貌大致相同。在豫东东部和西部的许多遗址中,都每可发现漳河型一类先商文化的因素。

本区未发现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地层。在二里岗上层,商文化以迅猛之势占据本区并向东推进,已发现的遗址有柘城孟庄^[36]、鹿邑栾台、淮阳双冢、西华商高宗冢^[37]、菏泽安邱堎堆等,文化特征与白家庄期近同。晚商文化遗存遍及豫东,已发现的遗址有夏邑清凉山、鹿邑栾台、柘城孟庄、淮阳平粮台、太康方城、菏泽安邱堎堆、杞县段岗等。本区商文化与殷墟商文化有较大的差别,过去笔者已将其命名为晚商文化“安邱类型”^[38]。

本区的早期考古学文化一直具有多种文化或文化因素共存的特点。

1.7 工作背景

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揭示出举世瞩目的商代晚期文化。为了寻找殷墟文化的来源,即早商和先商文化,1936年,中央研究院李景昉依据史籍中关于“南亳”的记载,在商丘的汉谷熟旧城、距谷熟西南30里处的顺河、坞墙(即《括地志》所谓的“南亳故城”之所在)“四面搜访南亳遗址”,“但毫无线索”^[39]。不过李氏一行在这次调查中却首次发现了一批造律台类型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从而开启了豫东近代科学考古的先河。

为了探索先商文化,1976~197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郑光、胡谦盈、刘忠伏等,在商丘地区诸县展开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所发掘的地点有永城王油坊、黑孤堆、柘城孟庄、睢县周龙岗、商丘坞墙、胡道壕等。其主要成果是发现了丰富的造律台类型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岗上层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晚商文化遗存也有所发现^[40]。赵芝荃等还在周口地区调查和复查了众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41]。这些工作为豫东考古的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遗憾的是,当时未能有效地揭示出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存,也即没有发现绝对年代约当夏代和成汤灭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当然,当时未能分辨出岳石文化也有客观原因,因为岳石文化的遗存虽早在60年代初即已面世,但被确认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已到80年代初了。

1984年春,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带领王迅、宋豫秦赴鲁西南地区的菏泽、聊城、济宁三地区考察,期间发现菏泽安丘堎堆遗址曾出土有施细绳纹的薄胎灰陶片和岳石文化标本。1984年9月,邹衡、王迅、宋豫秦、顾玉才、张国硕、赵古山以及菏泽地区的文物工作者,对菏泽安丘堎堆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主要成果是发现了岳石文化的地层和遗物^[42]。

1985年冬,宋豫秦在商丘地区调察期间,发现柘城山台寺、王马寺等遗址皆包含岳

石文化的典型陶片^[43]。之后几年里,其又多次赴商丘地区调查,与阎根齐、刘兆云等在夏邑清凉山、虞城杜集、商丘潘庙等遗址发现岳石文化陶片^[44]。

自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张文军在周口地区的鹿邑栎台遗址,发现了少量岳石文化遗存和似略早于二里岗下层早段的先商文化遗存^[45]。

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指导研究生张翠莲、进修生杨永贺并邀请宋豫秦参加,与商丘地区文物科阎根齐、刘兆云等对夏邑清凉山遗址进行小规模发掘,再度发现了较丰富的岳石文化遗存^[46]。

豫东是古代东夷集团、华夏集团和夏代夷、夏、商三大古族的交汇区,在本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对了解我国古代的夷夏分界和商族的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经过充分的思考和大面积的实地调查,我们在1989年和1990年,对杞县段岗、鹿台岗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1.8 工作目的

本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1. 填补开封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空白。
2. 探寻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和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的分界。
3. 寻找郑州南关外、二里岗遗址含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先商文化遗存的来源。
4. 适当进行古环境考察。

1.9 工作过程

为了重点寻找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分界,1988年冬至1989年夏,匡瑜、宋豫秦、丘刚、魏兴涛等三度在豫东西部的杞县、尉氏、兰考诸县实地调查,在杞县境内重点调查了段岗、鹿台岗、朱岗、孟岗、竹林等遗址。结合以往在鲁西南、豫东等地的调查和发掘结果,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我们感到在杞县进行发掘,有利于探讨夷夏分界等重大学术问题。

1989年秋,郑州大学考古专业86级本科生在宋豫秦的带领下,会同开封市博物馆考古部丘刚、刘春迎、张武军及杞县文物保管所,在杞县境内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和试掘。重点发掘了段岗遗址,试掘了朱岗^[47]、牛角岗^[48]和鹿台岗^[49]三遗址(图一),对全县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逐一进行了复查。其主要收获是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漳河型一类先商文化、东周文化和少量的岳石文化、仰韶文化遗物。

1990年秋,郑州大学考古专业87级本科生在张国硕、李峰、兼职教师宋豫秦的带领下,会同开封市博物馆考古部丘刚、刘春迎、李合群及杞县文物保管所,再次对杞县鹿台岗和段岗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主要成果是发现了较丰富的岳石文化和漳河型一类先商文化遗存。

参加发掘、整理的有宋豫秦、丘刚、张国硕、李峰、魏兴涛、刘春迎、李合群、张武军、雷兴山、鲍虎欣、李伟男、董全生、李培军、侯学卫、周煜、张卓远、王孝俊、刘

维、张二旗、鲍秋仁、靳宝琴、田言付、张慧明、高现印、何宏波、柳玉东、乔宝同、刘晨、吴爱琴、骆中宪、张春霞、徐云、胡渊、徐新军、孔祥海、张雪珍。参加整理的还有余新红、许俊平等。

注 释

- [1] 主要参考资料：a.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地图出版社，1979年；b.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河南省志》第六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 [2] 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
- [3] 马世之：《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大象出版社，1998年11月。
- [4] 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
- [5] a. 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观堂集林别集》卷一；b. 王献堂：《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
- [6] 主要参考资料：a. 时子明主编：《河南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b. 朱明伦、徐馨等：《中原东部第四纪环境及其影响的研究》，贵州科技出版社，1994年9月；c.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d. 河南地理研究所：《河南地理研究》，气象出版社，1993年5月；e. 盛福尧、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气象出版社，1990年7月；f. 杨景春主编：《中国地貌特征与演化》，海洋出版社，1993年；g. 徐馨：《中国东部全新世自然环境演变》，《第四纪环境论文选集》，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年10月；h. 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黄河历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i. 荆志淳、George (Rip) Rapp, Jr、高天麟：《河南商丘全新世地貌演变及其对史前和早期历史考古遗址的影响》，《考古》1997年5期。
- [7]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 [8] 同注[7]。
- [9] a.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钱穆：《水利与水害·上篇：论北方黄河》，《古史地理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2年。
- [10] 《竺可桢文集》第475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 [11] 转引自注[6] b。
- [12] 转引自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 [1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 [14] 郭田夫、张启龙：《菏泽地区的堽堆遗址》，《考古》1987年11期。
- [15] 法乃亮：《豫东地区降水的分布特征》，《河南地理研究》，气象出版社，1993年5月。
- [16] 同注[6] a。
- [17] 同注[6] b。
- [18] 主要参考资料：a. 魏兴涛：《豫东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概论》，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b. 段宏振、张翠莲：《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1年2期；c. 张志清：《豫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d. 宋豫秦：《试论豫东地区夏商时代的文化性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1期。e. 宋豫秦：《现今南亳说与北亳说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1991年1期。
- [19]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 [20]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二队、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4辑；b. 孙明：《商丘地区仰韶文化初探》，《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c. 赵世纲：《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d. 韩维龙、秦永军：《周口地区的裴李岗、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e. 王良田：《河南商丘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综述》，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
- [21] 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 [22] 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3期。